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The Establishment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Kanji*

潘 钧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潘钧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617-1

I. ①日… II. ①潘… III. ①日语—汉字—研究
IV. ①H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657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潘钧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617-1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 1/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本书出版得到了 2004 年度(日本)住友财团“亚洲各国日本相关研究资助”项目和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特此鸣谢。

目 录

序一	严绍璁	1
序二	冲森卓也	7
绪论		1
第一节 何谓“日本汉字”		2
第二节 研究日本汉字的意义		4
第三节 如何研究日本汉字		7
第四节 本书的框架结构		8
第一章 汉字的传入		11
第一节 文献记载		11
一、记纪中的记载		11
二、渡来人的活动与贡献		13
第二节 出土文物		15
一、金石铭文		15
二、其他辅证		21
本章小结		22
第二章 表记体系的初步形成		24
第一节 万叶假名的诞生		24
一、音假名的由来		24
二、训和训假名的确立		26
三、音训混用		28
第二节 和文体的产生及其表记		29
一、汉文的日本化		29
二、散文体和文表记		30
三、韵文体和歌表记		31
第三节 从万叶假名文到假名文		34
一、万叶假名文的出现		34
二、平假名文的产生		35
三、平片假名的发明		36

本章小结	40
第三章 汉字的历史演变	42
第一节 上代汉字	42
一、概述	42
二、《古事记》的文体	45
三、《万叶集》的用字法	47
第二节 中古汉字	52
一、概述	52
二、汉诗文的繁盛	55
三、汉文训读的展开	60
第三节 中世汉字	62
一、概述	62
二、“节用祸”的背后	66
三、汉语词的渗透及俗用	68
第四节 近世汉字	73
一、概述	73
二、庶民社会与汉字	75
三、西鹤作品中的“汉字词”	79
第五节 近代汉字	84
一、概述	84
二、夏目漱石的用字	87
三、小报纸中的“假借字”	94
第六节 明治以后的汉字	108
本章小结	109
第四章 汉字的使用与文体	111
第一节 汉文体	111
一、源流	111
二、文体特征	113
第二节 变体汉文	120
一、源流	120
二、文体特征	122
第三节 汉文训读体	129
一、源流	129
二、文体特征	132
第四节 和汉混淆文	139
一、源流	139

二、文体特征·····	141
第五节 真名本·····	142
一、源流·····	142
二、文体特征·····	143
第六节 往来物·····	145
一、源流·····	145
二、文体特征·····	148
本章小结·····	150
第五章 汉字的日本化·····	152
第一节 国字·····	152
一、国字的概念·····	152
二、国字的产生·····	153
三、国字的类型·····	156
四、国字的变迁·····	159
五、国字与现代汉语·····	160
第二节 国训·····	163
一、国训的概念·····	163
二、国训的产生·····	164
三、国训的类型·····	165
四、国训与借训·····	167
第三节 假借字·····	167
一、假借字的概念·····	168
二、假借字的变迁·····	171
三、表词假借字的使用·····	174
四、假借字的必然性和相对性·····	175
第四节 俗字与略字·····	176
一、俗字的概念·····	176
二、俗字的类型·····	177
三、俗字的变迁·····	178
四、俗字与略字·····	180
第五节 和制汉语词·····	185
一、和制汉语词的概念·····	185
二、和制汉语词的类型·····	186
三、和制汉语词的变迁·····	189
四、和制汉语词与汉语·····	190
第六节 字音形态素·····	193

一、文字形态素	193
二、文字形态素的原理	194
三、字音形态素的功能	197
四、字音形态素的构词模式	200
第七节 汉字的表音化	204
本章小结	209
第六章 现代日语中的汉字	210
第一节 现代日语汉字	210
一、日语汉字的性质和功能	210
二、日语汉字的数量和规格	212
三、从数字看两国汉字的异同	217
第二节 日语汉字的特殊性	230
一、日本汉字的特殊性	230
二、字音上的特殊性	233
三、字形上的特殊性	238
四、字义上的特殊性	243
五、字的用法上的特殊性	252
六、汉字意识上的特殊性	255
七、现代日语汉字的位相	255
八、日本汉字与日本社会文化	263
第三节 从表记的角度看日语汉字	269
一、表记的定义	270
二、日语表记的特殊性	272
三、汉字假名混合文中的汉字	273
第四节 日语文字体系的特殊性	275
一、“电视型”语言	275
二、“望远镜说”	279
三、日语文字体系的特殊性	280
四、重新建构文字学理论	281
本章小结	284
第七章 日本汉字的研究	286
第一节 古代汉字研究	286
一、近世汉字研究	287
二、近代汉字研究	289
第二节 现代汉字研究	291
一、战后汉字研究	291

二、最新汉字研究	297
第三节 日本的汉和辞典	299
一、汉和辞典的性质和种类	299
二、汉和辞典的发展历史	304
第四节 中国人对日本汉字的研究	307
一、古代的研究	307
二、现当代的研究	310
本章小结	314
第八章 日本汉字的未来	316
第一节 日本的汉字政策	316
第二节 安本美典的假说	319
第三节 “不可避的他者”	322
第四节 日本人的汉字观	328
第五节 日本汉字的未来	331
一、冷眼看待汉字热	331
二、日本汉字之我见	332
三、日本汉字的命运	341
第六节 中日汉字的互动前景	345
一、中日间相互影响	346
二、双方的合作前景	351
第七节 关于新常用汉字的讨论	353
本章小结	357
结语	359
大事年表	363
参考文献	369
事项索引	381
人名索引	391
书名索引	397
后记	404

序 一

严绍璿

潘钧博士的大著《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研讨了既是“汉字史”上的、也是“文明史”上的一个极有价值又极具趣味的课题，本书以宽阔的文化视阈和丰厚的原典材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学者睿智的思考。

从人类文明史上考察，作为记录人类思维、记忆和生存经验的文字的产生、使用、发展与传播，是构成人类文明进程的最基本的要件之一。人类生成的历史当然至为漫长，但是有书面可考的以“文字文本”记录而得以表述的文明史，大约分别起始于4000余年前的西亚、东亚、北非和南亚^①，即从最远古时代的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文明、以松花江、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以尼罗河流域为中心的北非文明、以及以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南亚文明。通过对上述四大对于人类文明进程具有宏大指引价值的文明区域的考察表明，它们都曾经产生过具有自己族群特性的文字，但是，唯有体现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汉字”，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不仅本身没有消亡，反而超越了生成的本土，在亚洲东部地域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中心纽带的，包括了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东部的“文明区域”。在这一广袤的地区中，尽管各族群（民族）形成并发展起了自己的多彩的本土文化，但是，几乎所有这些族群（民族）文化，都相继广泛地使用了“汉字”作为表达自己语言和历史记忆的载体，从而使这些族群（民族）获得了最终摆脱“原始（野蛮）时代”而得以进入“文明时代”的基本的社会元素，在世界文明史上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历史长久而文明进程未曾断裂的“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做出了并且继续着它

^① 这里说的“文字文本”，指的是从至今公认的人类由最初始的文字如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书写在各种“非纸质”的“物质材料”上而构成的“文本”一直到经过大批量的“纸质文本”而达于当今的“电子文本”。

的杰出的贡献^①。

“汉字”作为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如此悠久与辉煌历史的存在，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和极其有趣的课题，例如，四大古老文明区域的原发性“文字”在各自族群的自我发展中，为什么唯独只有“汉字”得以永久性地被保存，并发展为记录思想、表述语言和展示艺术形态的丰厚的文化体系？为什么汉族群（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不断地与异族群（异民族）反复多元地交涉接触（有和平的状态也有激烈冲突的状态，甚至有被异族群作为统治者的年代），而“汉字”则始终得以保存使用，并且为这些族群（民族）养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为什么“汉字”自形成之后不仅被本族群（汉民族）永久地使用，而且还被扩展到东亚广袤的地区，成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东部多族群表述自己族群摆脱“野蛮生存”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为什么上述东亚各族群在他们自己的“文字”产生之后“汉字”继续透入其中，经过多形态的变异而得以构成“朝鲜文字系统”、“日本文字系统”和“越南文字系统”？在东亚各国逐步“近代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单一性”的观念不断被强化，东亚地区除中华本土外相继出现了一些试图在所谓自己的“民族的文字”中“驱逐汉字”的观念和行动。从对20世纪东亚文化进程的实际考察可知，一些国家在自己的语文中“驱逐汉字”未能成功，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他们的内阁大臣（如伊藤博文内阁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曾经提出“把英语作为国语”，但是当“日语文”经过“民族生活的考验”后，他们终于感悟到不仅日本人还得使用“日语文”，就是在“日语文”中假如真的“驱逐了汉字”，除了造成“民族生活交流的混乱”和“对历史文本的隔膜”之外别无好处，因而至今仍然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常用汉字”，进入21世纪以来并有“增量”的趋势^②。“常用汉字”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和相关专业入行必备的基本知识，从而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保持了自己语文的“准确性”、“典雅性”和“丰厚性”，并使自上古以来保存的日本族群的历史文献能够有一个广泛的阅读层面和研究层面。当然，也有的国家和民族在自己的“语文”中强制“淡化”或“消弭”了本来已经属于他们自己民族文字系统的“汉字”，从而至少造成在社会层面中把握与使用“汉字”成

① 本文表述的“野蛮时代”、“文明社会”是文化人类学中的基本范畴，它们以“由狩猎进入农耕”、“由石器工具进入金属工具”以及“文字的产生与运用”作为根本性标志，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

② 以1945年战后状态考量，1946年“当用汉字表”为1850字，1981年“常用汉字表”为1945字，2011年新版“常用汉字表”增加了196字，删除5字，共计2136字。以上《汉字表》皆由内阁通过公布，具有“法定”意义。

为极少数人的“专利”，至今已经造成了本民族广大成员对（从族群时代以来）自己历史文化记忆的错讹和阻断，造成了他们在表述自己历史发展时运用“原典文本”的缺失以及在人文学术研究中表述相关主题的不可言状的困难^①。东亚近代进程表明，这一区域的任何国家和民族在自己的文化中如果“脱离汉字”或“驱逐汉字”，无论承认与否，实际上就是在“销蚀”自己的先民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一个割断和忘却了自己族群历史的群体，我个人觉得实在是很不幸的。从文明史的立场上思考，这又是为什么？

由“汉字”而引发的文明史研究的课题竟然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它显然是一个至今尚未有足够量开发的“文化矿区”。我国学者自上古时代撰著“尔雅”开始，就注目于“文字字义”（汉字训诂）的研究，从汉代许慎撰著《说文解字》以来，开始了“汉字本体论”（形声义）的研究，以其业绩而言，世界无出其右者。但就“汉字”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研究即作为“域外汉字”研究，也就是“汉字”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价值、形态及其意义的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则是一门较新的学科对象。前辈学者曾经表述过一些吉光片羽的见解，但时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域外汉字”的研究有更加开阔的拓展，关于这一课题的系统的研究就留给了他们的后辈^②。

潘钧博士以“汉字”东传日本列岛作为研究的基点，在多年研究日语汉字的基础上，以八章四十三节的宏大篇幅以及相应的附录，依据相当丰厚的原典文本为依据，把“日本汉字”放置于历史演进中的各个相关的时间段上，又在各个相关时段的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阐述，依据我粗浅的体会，大致就“汉字介入上古日本先民生活”、“汉字传入使日本语言获得了最初的表记体系”、“汉字在记录日本语言中的变异形态”、“假名生成的轨迹与汉字的透入”、“‘日文汉文体’的形态类别与递进轨迹”、“‘汉字’的日本化即日本‘国字’与‘国训’的形态”以及“现代日本语文中的汉字价值

① 这里表述的是我数十年来依据从事“东亚文化研究”中对相对广泛的相关国家的接触和考察中观察到的文化事实。2001年到2005年我受命担任“国际比较文学会东亚研究（协调）委员会”的主席（President），也倾听到相关国家人文研究学者就此状态的表述，综合而形成这样的判断。本文只是作者基于“事实”做出的判断，如果读者生发出其他的感受，那这仅仅是读者“自我文化语境”中的判断，并不属于我们在这里研讨的“汉字的文明史价值”的范畴了。

② 本文研讨的是中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点，不涉及国外学者关于这个领域的研讨状态。前辈学者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原东语系日语专业老教师魏敷训先生1938年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毕业论文，即是依据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的名著《（汉语）古音系研究》研讨“日文汉字”的“音读”问题，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魏建功先生则在他开设的“文字音韵训诂学”课程中又曾提到“日文中汉字的音读，或许可以成为上古汉语或中古汉语拟音的材料”、“将来得有人来做这项工作”等等，两位前辈的思考正好在“汉字古音研究”和“日文汉字音读”层互成伯仲，可以说这是我国学者“域外汉字”中“汉字在日本”研究设想的滥觞。

意义与新的变异”和“日本汉字的研究状态”等多个主题领域进行了视阈开阔兼具材料实证的阐释。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深感此书在“域外汉字”研究中对“汉字”东传日本的文化学术意义做了高屋建瓴的综合统摄，构成了一个具有“体系性”意义的表述。它既是一部“日本汉字”的文化学著作，又是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部以“汉字外传”为对象阐述“中华文化”在东亚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的著作。

50年前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曾经修业魏建功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学”课程，深感“汉字”的“形声义”内蕴价值的丰厚和复杂，但自己生性愚钝，未能有深切的体验和把握。后来又追随魏敷训和陈信德两位先生修学日文，他们都毕业于战前日本国立京都帝国大学，我深感他们不仅“日语”学得“很棒”，而且明显体会到他们对“日语文”中的“汉字”很有造诣。他们告诫我们，中国人学习日语文，最难的不是“语法”，而是其中的“汉字”，记得魏敷训先生引用丰子恺先生的话说，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阅读“日文书”，假如他不懂日文，依靠文中的汉字，大概能够明白“20%左右”的文意，你如果学了两年日语，你能弄明白的意思大概也就是“20%左右”，前者是“猜的”，后者是“懂的”。先生甚至说，全世界的人学习日文，最难的就是“日语文中的汉字”。让我听得极其惊讶、好奇。当我慢慢地学习了一点日语文后，才明白前辈的警示具有极为深刻的“文化学意义”。

此种文化学意义，是由于“汉字”内部蕴藏着自身特有的“张力”，它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中“变异”，而与自身遭遇的特定“文化语境”相协调并展现自身的价值意义。当“汉字”进入日本之后，它进入了“日本文化语境”，成为“表述日本语言的汉字”，这就是说，“汉字”传入日本后，它就“变异”为具有“日本语言”特征的“字”，成为以“书写”形态表现日语的“工具”。“汉字”的造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继而衍生出“指事”、“会意”、“形声”等^①，而一旦成为“日本汉字”，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成为“表音”的符号，失却了“象形”的意义；但有时候又具有“表意”的功能，但这与“汉字”本源性的“象形”没有关系。当它在“表音”时，日本文化汲取的是此字在中华本土特定时段和特定区域的那个“声音”；当它在“表意”时，关注的则是它在中华本土特定时代中承载的“意义”，从根本上讲，这与“汉字”原本的“形义”有关而与“汉字原音”无关，一个“单音字”变异为“双音”、“三音”的很多，这时的“汉字”成为承载日本语言中相同意义的、特定概念的“语音载体”

^① “汉字”的造字原则，传统学说归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习惯上称之为“六书”。但后世学界也有持“四书说”、“三书说”的，但较多的学人认为“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不是“造字法”，此处仅是提及而已。

(例如汉字“娘”，汉语发声“niáng”，古代汉语意为“女孩”、“姑娘”，变异为“日文汉字”则成为日语中原有的“むすめ”的载体，而与汉语中的原声“niáng”毫无关系了)。“汉字”在日本语言中表现为“音”和“义”，在日本文化系统中则呈现出千奇百怪、丰富多彩的一面，“日本文学史”据此定义为“音读”和“训读”。汉字的“音读”和“训读”是随着日本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它一直处于能动的状态中。面对这样的语文状态，不要说仅仅认识“中国汉字”的人常常会处在茫然之中，就是在日本文化和语言领域中已经入门的人士，也时常会觉得困苦不解，而每当我与欧美的“日本学研究者”谈到阅读日本自《古事记》、《万叶集》以来的“日本古典”时，大都会苦笑着说“太难了，太难了！”“不知道文章中的汉字，什么时候是表音的，什么时候是表意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这样的现状，使我们对“日文中的汉字”的内奥充满想象，也一直有所期待，希望有一位“汉字母国”的学者能够对传入日本一千余年的“汉字”的机能和价值做一个清晰的科学的梳理。虽然关于这一层面断断续续的有些关于“日文汉字”的研究报告，但似乎还缺少系统性的梳理。潘钧博士的大著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能动的独特的“日文汉字系统”以“文化变异”作为观察的理念引导，在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对此做了具有系统价值的分条缕析。我个人感知，此书至少在两个层面具有相当的理论建设的价值。

第一层面是它既梳理了“日文汉字”在多语境中的多形态价值，也揭示了“汉字”本体与“特定的”日本文化状态相互匹配的内在机理，提出了“日文汉字是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的概念，这一具有理论意义的建设，无论对于“汉字本体”(即汉语汉字)的研究，还是对“日文汉字”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思考与智慧。

第二层面的价值在于对“日文汉文”的梳理和研究。“日文汉文”与“日文汉字”是统一本体的两个侧面。最早期的“汉字”的东传是以“汉文”为母体的，即汉字最早进入日本是以“汉文”的形态存在着的。依据我的认知，“汉文”大约是由从公元前4世纪左右到公元4~5世纪左右中华本土向日本列岛陆续的“迁移民”携带进入日本列岛而成为最早的“语言”记录样式的。由于撰写“汉文”要求的“语法逻辑”与“日本语言”的“语法逻辑”是不一致的，因此，早期的书写只是极少数人的事业，随着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书面文化的接触面逐渐扩大，“汉文文本”从内容到形态，逐渐演变成“日本汉文”。“日本汉文”的逐渐成型，它是日本民族从“神话集体书写”发展为“古物语文学创作”的中间过渡形态，从而推进了总体日本文化的载体形态。在日本历史进程中，在“假名”形成后，“日文汉文”紧密地适应日本文化的需

要,与“假名书写”相得益彰,发展成为多种形态^①。我国人文学界长期有一个误解,至今仍然有不少学者把多形态的“日文汉文”作为“中国汉文”的一种形态,导致在脱离“日本文化语境”中研讨文本本身,造成许多的不可解和谬误。潘钧博士在大著中把“汉文体”作为“日文汉字”流变的一个层面进行阐述和研讨,这是至为妥当和必要的。此书对“日文汉文”的研究有两个关注点是极有价值的。第一,以“日文汉文体”为总纲,梳理而确认在这个总目下,事实上存在着“汉文体”、“变体汉文”、“汉文训读体”、“和汉混淆文”、“真名本”和“以变体汉文为基础文体的往来物”等多元体式,因此研究者只有对这些“体式”中的经典性文本有过接触和研究,才可以说是进入了“日本汉文”的研究中;第二,“日文汉文体”的递变与它的多样式的成型,与“日文汉字”一样,它是与日本文化本体的语境密切相关,从而确立了多元的“汉文体”形态与特定的“日本文化语境”相互匹配的内在机理。

潘钧博士的大著,以其多年的努力,展示了以“汉字”为基本元素的日本文化中的“书写系统”和“文式系统”,揭示了“汉字”进入日本列岛之后,在漫长的历史中创建,以自身丰厚的文化内蕴变异而成为日本文化系统的基本构成元素,由此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文化人,催生了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推动了“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的发展。

潘钧博士此部大著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规划中,又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刊出,我由此也感受学界对此书的评价大约是相同的。便把自己一点浅薄的感悟撰写于此,供阅读者参考。承蒙潘钧博士的好意,为他做此书的序文,真是愧不敢当的。

2013年5月2日撰写于北大静园

严绍璿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学部委员

(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国家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学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主任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对此稍微详细的解释阐述,如《日本古物语〈竹取物语〉》的生成研究载《多元之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刊);《日本“浦岛文学”成型中“中间媒体”的意义——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基础性研究之一》载《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刊);《日本の古代文学を発生学から考える》载《日本—中国交流の諸相》(日本勉誠社2005年刊);《〈浦島伝説〉から〈浦島子伝〉への発展について》载《IMAGES AND JAPANESE LITERATURE》(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2002)等。

序 二

冲森卓也

语言的传达通过语音(音位)或者文字以及具有完整内容的句子(文章)完成。通过语音的传达是第一性的,同时又是本原性的,但文字的发明使得语言的传达能够超越空间与时间,在此意义上又是极具文明意义的。世界文字的历史肇始于苏美尔文字(楔形文字),在东方汉字则为母胎,其起源是象形文字,不久便有了指事、会意的手法,后来又具备了形声这一造字手段,这些在大约公元前 3500 年的苏美尔文字中均可得到印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字的产生以少数的字素为基础,文字的派生也有一定的规律性。

汉字传至日本列岛是出于 3、4 世纪东亚国际形势的需要。后汉(东汉)灭亡后,东亚政治情势变得不稳定,朝鲜半岛开启了三国时代,其中百济通过输出最新的大陆文化,联合倭国来确保自己的领土。汉字、儒学、佛教的传入皆为百济对外政策的一环。7 世纪日本派出遣隋使,接下来被遣唐使取代,借此来直接移植中国文化,而非经由朝鲜半岛。正因为如此,日本的汉字最先是承袭了朝鲜半岛汉字的用法(本书第一章)。

渡来人将朝鲜半岛的汉字从字体到字音原封不动地带到了日本列岛。所谓的万叶假名本源于假借手法,但经由朝鲜半岛被带至日本,被用于专有名词的表记,之后甚至还被普及至韵文的表记。一个系统不同的语言在借用一种表词文字时,除了借音外还会产生训的用法,这在借用苏美尔文字的阿卡德语言中已有先例,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亦然。训表面上看似乎是日语特有的现象,但可以说普遍存在于借用表词(表意)文字的场所。只不过是由于辅音文字的产生,导致像苏美尔文字、埃及文字这样的表词文字过早衰退,惟有汉字的日语训却如化石般留存了下来,并且通过借用训,使得万叶假名的字母愈加丰富起来。

汉语与日语音节构造不同,基于近似日语发音的汉字读音,万叶假名作为音节文字固定了下来。对于以开音节为主的日语来说,假名表示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并且日语音节数量又少,故此成为非常有用的

文字体系。直至 8 世纪为止,还存在“上代假名拼写法”,但 9 世纪以后,原本有区别的音节数量减少,若忽略浊音不算,区区 48 个假名便可用表音的方法来表记日语了,其简便程度足可用“表记革命”来形容。即使不懂作为智慧源泉的汉字汉文,日本人也可以用作为日常语言的母语日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于是才有了日本独自文化的展开(本书第二章)。

由于受政治、社会及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一个时代的汉字演变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上代全部使用汉字,平安时代初期汉诗文臻于鼎盛,中后期平片假名的发明使得日本国风文化迎来了高潮。中世以后识字阶层扩大,佛教普及和世俗化导致汉字走向了武士乃至庶民阶层,假借字、和制汉语词等大量涌现。近世出版文化发达,寺子屋等教育机构兴盛,特别是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唐话词汇的流行,汉字使用遍布于社会各个角落,愈加成为庶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促生了大量国字和假借字。明治以后,特别是大正时代汉诗文出现了明显衰退,汉字使用大为减少。但另一方面,汉字作为构词成分在近代新汉语词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第三章)。

日语史中的文体主要是指根据语言构造和文章记载形式上的差异所做的分类。在日语历史上,曾产生过汉文体、和化汉文(变体汉文)、汉文训读文、和汉混淆文等文体。由于受制于力求全部用汉字书写的主观意图,于是在变体汉文、真名本等当中产生了诸如假借字等汉字变体,在汉文体中产生了所谓“和臭”的日本独特的汉字用法,这些均给现代日语汉字带来了很大影响。换言之,以文体为线索对导致日本汉字及用法产生的环境因素进行把握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本书第四章)。

接下来,再看一下日语中的汉字。“形音义”属于汉字的基本特征。日语“広”这个字的字形为“𠂔”,看上去既非“廣”亦非“广”;同时,该字的字音为“コウ”,字义为〈ひろい〉,可见与现代汉语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这些均带有日本独自的特征,于是便让我们认识到: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広”这个字,日语中的全部汉字都可以说具有“日本”的特征。追本溯源,当我们说表词文字汉字如“広”这个字表达的是日语〈ひろい〉这个词的时候,在此时点上它已经成为日语的表词文字了。日本汉字的生成,不论是仅限日语当中才有的“国字”(字形),还是日语独有的“惯用音”(字音),抑或惟日语才有的“国训”(字义),这些都是基于汉字基本性质的变体。汉字作为构词成分形成词,其构词法也是基于日语的思维模式,这也正是汉字作为日本的文字发挥作用的结果(本书第五章)。

日语中的汉字普遍具有“训”的用法,这就决定了今天日本汉字的功能。